

“zoē”是“赤裸生命”吗？

——重思阿甘本政治哲学两个基本概念的关系

郑雨晨^{1,2}, 王雨辰²

1.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5;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3)

摘要: “zoē”和“赤裸生命”是阿甘本政治哲学中两个重要的基本概念, 而现有研究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看法存在分歧, 澄清这一问题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阿甘本的理论逻辑具有重要意义。辨析这两个概念关系的关键在于理解阿甘本的“门槛”逻辑。门槛是接合内外的无区分地带, 是被系统以排斥的方式纳入的东西, 它的存在使内外区分成为可能。zoē是所有生物都共有的“活着”这一简单事实, 即自然生命, 与有质量的政治生命形式 bios 相对应, 作为政治否定性基础的赤裸生命则是政治权力通过对 zoē 的纳入性排斥生产出来的。政治权力通过否定赤裸生命, 使另一部分生命获得了政治的形式即 bios。因此 zoē 是与政治无涉的、无形式的生命, 而赤裸生命则是政治权力的产物, 具有否定的形式。赤裸生命不是 zoē, 而是 zoē 与 bios 之间无区分的门槛, 它标识了划分 zoē 与 bios 的界限。

关键词: 阿甘本; 门槛; 纳入性排斥; 赤裸生命; zoē; bios

中图分类号: B5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6-0001-11

近年来,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国际和国内学界持续走红, 其政治哲学“提出了一批全新的理解当代政治哲学的存在论范式和装置, 引导我们走进一个传统政治哲学断裂后的生命政治学思考深渊”^{[1](P)}, 面对当下的诸多政治现象表现出极强的原创性与解释力。诚如米格尔·法特(Miguel Vatter)所言, 阿甘本所提出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例外状态”(the state of exception)和“神圣人”(homo sacer)等概念已经成为全世界政治和哲学研究者的“词汇通币”^[2]。但中外学界对阿甘本政治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zoē”和“赤裸生命”关系的理解存在着分歧。正如约翰·莱彻特(John Lechte)和索尔·纽曼(Saul Newman)所指出的, 阿甘本抛出了研究当代社会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的一个难题, 即 zoē 和赤裸生命的关系^{[3](62)}。

纵观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 对于 zoē 和赤裸生命关系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 一是认为 zoē 是前政治的存在, 而赤裸生命是政治权力作用的产物, 所以 zoē 不是赤裸生命。例如张一兵认为, 赤裸生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作为直观物性生命的 zoē, 它是生命在特定的社会构境与政治构序中呈现出的状态^{[1](178-179)}; 吴冠军认为赤裸生命不是自然生命, 而是被政治化、时刻面临着死亡威胁的生命^[4]; 凯瑟琳·米尔斯(Catherine Mills)认为赤裸生命是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政治化存在^[5]; 阿勒·德·波尔

收稿日期: 2024-03-18; 修回日期: 2024-06-23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研究”(22AZD09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5批面上资助项目“阿甘本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24M753664)

作者简介: 郑雨晨, 男, 湖北襄阳人, 哲学博士,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 联系邮箱: 1659439284@qq.com; 王雨辰, 男, 湖北黄陂人, 哲学博士,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文明理论

(Arne De Boever)认为赤裸生命是被政治化后剥夺了生命形式、被主权排斥的生命^[6]；托马斯·莱姆克(Thomas Lemke)认为赤裸生命并不是前社会的自然生命，而是被历史地塑造和修改的结果^[7]；凯特·吉拉尔(Katia Genel)认为赤裸生命并非“天生的、自然的和超政治的事实”，而是一种司法政治建构^[8]。二是认为 *zoē* 是无品质、无形式的，而赤裸生命则是“无价值的”“有害的”，具有否定的形式，所以 *zoē* 不是赤裸生命。例如亚历克斯·默里(Alex Murray)指出：“一切通过给生命加上‘好的’或‘赤裸的’这样的属性，给生命以品质的尝试，都在远离 *zoē*”^{[9][65]}；姚云帆也指出，赤裸生命是 *zoē* 的否定形式，*bios* 是 *zoē* 的肯定形式，*zoē* 是两者的质料^[10]。三是认为赤裸生命是不具政治资格的动物式生命，因此赤裸生命就是 *zoē*。例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1]、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H. Bratton)^[12]、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和尼克拉斯·罗斯(Nikolas Rose)^[13]以及汪民安^[14]就持这种观点。

梳理上述分歧并追问其形成原因，澄清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阿甘本的理论逻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大致同意上述前两种观点，即 *zoē* 不是赤裸生命，但认为相关论点有待深化和推进，以把握“赤裸生命”的居间性和界限性，正确理解被政治排斥的赤裸生命何以被政治化并区别于 *zoē*。为此，我们必须引入阿甘本的“门槛”(threshold)概念并以此为轴心展开辨析。

一、内外无区分的“门槛”

对于“*zoē*”和“赤裸生命”的关系，阿甘本曾在2013年法国的一次讲座中提及。他明确表示：“不要混淆赤裸生命和自然生命，这一点非常重要。”^[15]他指出：赤裸生命是被政治例外装置所预设的，它是 *zoē* 和 *bios*、自然生命和具有政治资格的生命之间的门槛^[15]。要正确辨析“*zoē*”和“赤裸生命”的关系，关键就在于理解“门槛”的逻辑。所谓门槛，既不属于内部，也不属于外部，而是一个内外无区分的地带，是标识内外之分的界限，在接合内部与外部的同时使内外的二元区分成为可能。阿甘本在一次访谈中指出，经典政治哲学的“公/私”(即国家与政治/家政与劳动)二分传统下的范畴的解释力正在日渐衰弱，要真正发现问题所在，就必须将对立看作“二重对立”而非简单的“二分”^[16]。阿甘本理论的创新性与解释力正是源于对二分思维的超越，他提出的“门槛”在传统的二元区分中间加入了一个无法区分的过渡与模糊地带，从而解构了二分的辩证法。

经典西方政治学自古希腊始就以二元区分作为理论的基本模型，例如公民与外邦人、主人与奴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主奴辩证法来阐释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主人意味着统治，而奴隶代表被统治，主奴的辩证关系造就了人类的历史。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也以二分的方式将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划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抗构成了人类阶级社会的主题。二元区分的结构是存在 A 和 B 两个被明确区分的区域，非此即彼，非内即外，非 A 即 B。阿甘本的“二重对立”逻辑则意味着存在一个非 A 也非 B 的灰色区域，它虽然不属于 A 和 B，但又不是简单地游离于 A 和 B 之外，不能独立存在，而是 A 和 B 相互交织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混沌地带。正是这一地带的存在，使得区分 A 和 B 成为可能，或者说，这一地带就是区分 A 和 B 的界限本身。“在这种逻辑中，要在两个实体之间划分出清晰的界限并使之分离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你就可能发现一些不可决定或无差别的区域。例外状态就是这样的区域之一。”^[16]

阿甘本在这里提到的“例外状态”，正是理解他门槛逻辑的钥匙。通过对德国公法学家、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例外状态”理论的批判性解读，阿甘本阐发了他独特的“纳入性排

斥”逻辑与内外无区分的“门槛”结构。施米特认为,例外状态之所以是“例外”,是因为它具有不可预料性,无法被规范所框定。它的出现危及了共同体的生存,因而必须赋予主权者悬置具体宪法条文、以强力手段维护秩序的决断权力。在这一状况下,主权者虽然在法外行动,但其行为却获得了合法性。因为法律规范的有效性本身有赖于主权者对秩序的维护,而紧急状况危及了现有秩序,所以主权者必须以超越于规范之上的方式捍卫政治秩序。对主权者而言,“尽管他处于在正常情况下有效的法律体系之外,然而他同样属于这种体系,因为他正是决断宪法是否需要被中止的人”^[17]。也就是说,主权者在法律规范外的行动,恰恰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存续,所以不能被视作“违法”。在施米特看来,政治共同体和法律秩序的存在依据的不是某种客观标准,而是主权者以绝对力量为其奠基的决断,也就是国家绝对的独立自主权。

对此,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的空间,就是一个法内外无法区分的门槛地带。在这一空间内,主权者通过悬置具体法律条文,将法外的事实纳入秩序与规范当中,从而赋予自身法外行动的合法性。因为法律条文的有效性,只有通过主权对例外状态的决断才能获得保障。“主权者‘创造和保卫了情境’,法律需要这一情境来保证自己的有效性。”^{[18][17]}法律的这一结构同语言相类似。我们在使用语言言说事物时,必须依靠人的言说行为来使作为“空壶”的语言符号过渡到现实中的具体事物,让后者来填充前者。因为实存的具体事物不可能自动与符号相关联,必须依靠人的言说实践来实现两者的缝合,使能指与所指相对应,而这个言说实践是无根据、无条件的强制行为。法律规范与实存事物的对接同样也需要一个行为实践,这个行为实践就是主权在例外状态下的决断。在例外的空间中,“法律的效力”被从具体的规范形式中抽离,注入主权者的决断行为之上为其赋能。这样一来,原本属于法律规范之外的例外,被主权者吸附了“法律效力”的决断行为纳入法的统治内,呈现出事实与规范无区分的状态。法律正是通过悬置自身、生产例外的方式连接法内与法外,并以此建构、维持自身。因此,例外正是法内与法外、事实与规范之间无区分的门槛,这个门槛预设了规范和事实之间的否定性关系,即和对象毫无关系之物的关系。这一关系在否定后者的基础上确立前者,前者由此实现了对后者的纳入性排斥(*inclusive exclusion*),使后者成为内外接合的阈限;后者作为外部被纳入内部的同时,又作为内部被推向外部。阿甘本指出,在许多欧洲语言中,“在……外面”(outside)的概念都是用“在门口”(拉丁语 *fores* 的意思是房门)、“在门槛上”(希腊语 *thyrathen* 的意思是门槛)来表达的,因此,“外部并不是另一个存在于确定空间之外的空间”,而是得以接触外部的“通道”,“门槛是对界限本身的经验”^[19]。

在阿甘本看来,这种门槛结构广泛地存在于整个西方文化与社会领域中,因为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规范构筑、约束并维持运转的共同体。通过对社会各领域分门别类地进行规范建构,人类才从原初的混沌世界中离析出自身的生存世界,世界便有了好与坏、善与恶乃至社会领域和阶层的划分。但是这种离析必然具有局限性,因为人类有限的理性无法将世界整全地纳入规范之中,只能从部分出发去把握世界,而无法被纳入的剩余则被人类社会的规范系统所排斥,成为例外。

规范系统的搭建以对例外的划定与排斥作为前提,它需要将不同个体的差异性湮灭掉才能将其整合进自身。但例外不是被简单地排斥从而与规范完全无关,而是“以悬置规则的形式保持着它与规则之间的关系”^{[18][17-18]}。规范需要例外作为界桩确证自身,因此规范正是以悬置和撤离自身的方式作用于例外,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发生关系。如果我们说,“我讨厌小资产阶级的虚伪做作”,那么我们就通过否定的形式与“小资产阶级”发生了关系。否定性关系需要否定对象,因此我们在否定(排斥)“小资产阶级”的同时又将其纳入这段关系中。概言之,纳入性排斥就是将事物置于外部、对其进行否定的同时又将其吸纳到与自身的关系中,并将其作为基础建构自身,这就是门槛结构的运作逻辑。

在阿甘本看来,任何规范系统的搭建都依赖于门槛的纳入性排斥逻辑。无论是西方形而上学还是

政治学,其基本问题都受制于门槛的结构。因为形而上学对存在显现问题的探讨,以及政治对人类共同体规范的设定,都意味着对原初的杂多之物的整合,个体经验在思维整体中必然经历一种规范化与一般化的抽象运动。阿甘本在《神圣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一书的结尾处明确表示,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活动是对纯粹的存在领域的隔离,而这与西方政治隔离赤裸生命的做法是相似的,两者都是凭借这种排斥与隔离来建构自身,具有结构性的关联^{[18][182]}。西方形而上学通过语言为存在规定外在本质的同时对实存进行了纳入性排斥,复刻了西方形而上学例外结构的西方政治同样在对赤裸生命纳入性排斥的基础上建立与维持自身。“西方的本体论——生命政治机器建立在对生命进行划分的基础上……我们称作政治的东西首先就是一种生命的特殊资格,它通过穿透自然身体(the very body of zoē)的一系列区分来实现。但是这种资格的内容,除了中止本身的纯粹事实之外别无他物。”^{[20][203]}这个中止的点,正是作为门槛的赤裸生命。

二、作为“门槛”的“赤裸生命”

要理解何为“赤裸生命”,必须从“zoē”和“bios”这一对子概念出发。阿甘本指出,古希腊时期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词语,像当代的“life”一样同时具有生命和生活的双重含义,当时的“生命”与“生活”的含义分别是由“zoē”和“bios”两个概念来表达的。zoē表达的是一切生物(包括动物、人和神)所共享的、仅仅“活着”的简单事实,即“一条命”的“命”。它没有复数形式,因为所有的zoē都是同质的,不具有形式上的差别。因此,zoē就是生物性的自然生命,是未获形式之存在。Bios则具有异质性,它是指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特有的生命形式或生活方式,尤指人类有质量的、政治性的生活。

阿甘本指出,获得bios的前提是排斥和否定zoē。“人,即有logos的动物的含义,就是建立在对这种营养生命的排除之上的。”^[21]法律与语言具有相似的门槛结构,政治共同体的构筑同样与语言息息相关。政治意味着有意义的、好的生活方式,而人类要言说意义与进行价值判断,就必须远离原初无意义的语音,使自身语言与言说对象之间建立起符号学意义上的关联。为此我们必须构筑一套语法规则,而声音正是语法规则预设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例外的结构——包含性排斥——让对生命的把握有可能变成政治。正如人的自然生命是通过赤裸生命形式的排斥来包含在政治中的,那么人类语言(毕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语言奠定了政治城邦)是通过‘赤裸声音’的包含性排斥在言说中产生的。”^[22]

这里的“赤裸声音”,指的就是前人类语言的纯粹语音,阿甘本称之为“大音”(Voice)。在阿甘本看来,这种“赤裸声音”并不同于动物发出的声响,它是生命不同于动物但还未成为人的过渡状态下即“人形动物”所发出的声音,是作为门槛的语音。它虽然还不具有明确意义,但是已经具有“分节”(articulation),它区分了生成语言的声音与动物杂乱的声响,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因此,“大音”是语言的一个例外状态,具有主权般的决断力量。它在使动物声音向人类语言跨越和转化的同时,也制造出赤裸的声音与生命。

在阿甘本看来,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具有逻各斯的动物”的命题开启了西方生命政治的先河,完成了声音政治向生命政治的过渡。上述命题意味着人必须按照某种标准使自身与动物相区分才能确证自身,这个标准就是“政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动物不是政治的,因为它们的语言无法表达正义与不义、好与坏,只有人类的语言才能言说正义与至善,因而只有人类才能进入城邦。“‘活着的存在以何种方式拥有语言?’这个问题与‘赤裸生命以何种方式居住在城邦中?’具有绝

对的一致性。活着的存在通过拿走并保存自己的声音而拥有逻各斯,甚至通过让自己赤裸的生命被排斥在外,作为居于其中的一个例外而生活在城邦内。”^{[18](8)}通过对赤裸声音的抹除,人类得以用语言言说意义,为生命设定目的,进而建构与识别自身,将人的生物性生命(zōē)和政治生活(bios)区分开来。为了获得后者,就必须摆脱前者的存在状态。借此政治复刻了人类语言的结构,即对门槛式的赤裸存在的纳入性排斥。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潜能”(dynamis)并以实现它为目的,实现在“公式”“时间”与“本体”上都优先于潜能^[23]。潜能实现自身的过程,即以可见的、有限的、固化的方式将不可见的、无限的、流溢的东西显现出来。存在通过进入一种人为设定的、想象的外在关系才能被呈现,以某种外在标准使自身获得规定并实现自身,存在由此进入了一种例外关系中。通过对本真存在状态的排斥,存在在形而上学的符号系统中获得了一个位置。

在这一本体论思想的指导下,亚里士多德将生命区分为两部分:仅具有营养能力的生理性生命和具有理性与灵魂的生命。他认为前者是所有生物共有的,只有后者为人所独有。人因具有理性高于其他生物,但同时人又具有选择的自由意志,可以为善成为似神之人,也可以为恶堕落为动物。人类潜能的实现,就是混沌状态下的“非潜能”(adynamia)式生命在形而上学的机制下被划分为 zōē 和 bios,并被架构为具体存在者(拥有 bios 的 zōē)的过程。这导致生命被预设的外在规范牵引,背负起必须成为某物的历史任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理性并不是被先天直接给予的,而是需要后天的培育和践行的,如此方能实现生命的潜能,达至人性的完满。

对应在伦理与政治层面,质料获得形式正是人实现自身政治潜能的过程,作为“形式”的政治生活在价值上高于作为“质料”的纯粹生物性生命。在古希腊,停留于家庭领域的生命(尤其是奴隶)是残缺不全的,被视为与动物无异的 zōē;只有进入城邦政治领域,生命才能获得完满,成为具有 bios 的“人”。人们组建家庭是为了进行物质生产以满足生存和人口再生产,即“活”;而组建城邦是为了达到至善,即“活得好”。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通过将家庭领域排斥在城邦之外,亚里士多德将政治定义为追求至善的人摆脱与排斥自身动物生存状态的行动。这与存在实现潜能时搁置自身的“非潜能”状态具有同构性,“某种东西在最底层被分割、被排斥、被拒绝,而它又通过这种排斥,作为根基被包含其中”^[15]。

阿甘本认为, zōē 与 bios 的分裂造就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即西方政治总是按照某种标准来区分 zōē 和 bios、外部和内部,并将 zōē 排斥在政治之外。凭借这种排斥,西方政治才能为自身奠基。“这种对生命的划分直接就具有了政治的意义。自从自然生命(zōē)实现了自主并将自身建构为政治生命(bios politikos),那么它就必然遭到分割,并且其中一个部分会被排斥,同时也会被纳入和置于政治的否定性基础。”^{[20](202)}政治应许着生命的“好”,恰恰是为了凸显自身相较于“单纯地活着”的优越之处。不否定后者,前者的“好”就无法凸显。因此,虽然 bios 在价值上高于 zōē,但 bios 同样需要作为基础的 zōē。zōē 一旦被纳入政治秩序所构筑的否定与排斥关系中,就被生产为赤裸生命,成为政治的否定性基础。故此赤裸生命并不是与政治毫无关系的自在之物,而是政治必须否定的对象,通过对它的否定,政治才能划定自身的边界,并区分内外。在政治权力的作用下,赤裸生命脱离了单纯的动物状态,但尚未成为人;它拥有人的外形,却未获得人专属的 bios,不具有政治生活的形式,因而它是一个人与动物无法区分的门槛地带。

西方政治的建立与维持始终有赖于对门槛的设定,即对赤裸生命的生产。“政治几乎是生命必须自我转变为善好生活的地方……在西方政治中,赤裸生命有一种特殊的存在特权,对它的排斥建立了人类的城邦。”^{[18](7)}zōē 唯有屈从于权力,将自身无条件地交付给主权,通过自身的政治化来获得 bios,才能以政治资格为中介获取主权的保护。但如此一来,主权也就获得了对生命的绝对权力,可以随意

界定某种标准并以此区分和拣选自身要保护的生命和要杀戮的生命,即通过悬置“劣质生命”的权利,使其丧失保护而直面暴力。赤裸生命虽然被排斥在政治共同体的保护之外,但是又处于政治权力作用的范围之内,遭受着权力的戕害,比自然生命的生存境况更为恶劣。因为权力为了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会主动制造作为“他者”的敌人,剥夺他们作为人的政治资格,并对其施加暴力。

在阿甘本看来,正是由于西方政治结构性地渴求赤裸生命,才导致了西方现代生命政治的大爆发。在崇尚灵魂、理性与崇高的西方古典社会中,从 *zoē* 到 *bios* 的转化是为了获得一种至善的生活,具有强烈的伦理意义。此时的赤裸生命存在于城邦政治的边缘地带家庭中,尚未被权力过多染指。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变迁,西方现代社会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价值判断退出了公共领域而被交付给私人,个体的利己本性与世俗欲望获得了肯定。因此生物性生命本身的存续与舒适成为政治的头等大事,现代西方国家开始专注于生命安全与经济事务,并将其作为自身存在的目的。这使得在古典政治中处于政治边缘的赤裸生命在现代进入政治的中心场域,生命政治开始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登堂入室。“现在,赤裸生命完全进入了国家结构,甚至成为国家的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18](127)}随着现代社会对“活得好”的理解发生变化,生命优劣的价值标准也发生了改变,现代社会中赤裸生命与 *bios* 的区分标准,由古典政治时期的灵魂、自然理性和美德转变为生物性生命本身的血统、种族和质量等因素的优劣,以及对共同体成员的整体生命有利还是有害,从而“在自然生命中区分出一种所谓的具有政治资格的生命和一种缺乏任何政治价值的生命”^{[18](132)}。

如此一来,以保护与提升生命为目标的现代政治悖论性地对生命举起了屠刀,因为杀死“有害的”赤裸生命有利于保卫“有资格的生命”(qualified life)。越是杀死作为“病菌”与“害虫”的赤裸生命,“有资格的生命”就越是优质与健康。在合目的论之下,消灭赤裸生命被视为是正当的,因为它作为手段服务于保卫和提升生命的历史任务。一部分 *zoē* 获得 *bios* 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另一部分 *zoē* 被再生产为赤裸生命,两者并行不悖。所以西方现代社会对部分生命的屠戮与戕害愈演愈烈,主权者在保卫生命的名义下,随意悬置个体权利,越来越频繁地宣告“例外状态”,乃至将例外状态常态化。西方现代国家维护公民的身体健康、人口平衡与发展经济是生命政治的正面,纳粹屠杀犹太人是生命政治的背面,两面皆服务于“照料生命”这一现代政治的目标。我们可以看到,纳粹建立集中营、美国租借古巴关塔那摩湾建立军事基地无限期羁押恐怖分子嫌疑人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建立离岸拘留中心处理“非法移民”的行为,正是创造出一个内外无区分的例外空间从而无限制地行使生命权力的实践。

依阿甘本之见,在“生命安全”的名义之下,我们已经陷入永恒的全球反恐战争。任何致力于人权保障、将更多人囊括进公民身份中的做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更多的生命遭受奴役,因为主权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通过决断例外状态制造作为门槛的赤裸生命。越是想要将更多的个体纳入政治资格中,就越是需要强化区分内外的门槛,越是需要诉诸主权的绝对力量。“个体在通过他们与中央权力斗争赢得空间、自由与权利的同时,又总是隐秘地准备好将不断增加的个体生命铭刻在国家秩序中,并因此为他们想从其中解放出来的主权利力提供新的、更可怕的基础。”^{[18](121)}这正是生命政治幸福美好而又阴暗恐怖的雅努斯的双面。

三、对“zoē”与“赤裸生命”关系的辨析

辨析“zoē是赤裸生命吗”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赤裸生命之“赤裸”,是否意味着不受政治资格的赋形与保护。从表面上看,zoē确实与赤裸生命一样,都是缺乏政治资格的草芥般存在。由于缺乏权利的保护,杀死zoē和赤裸生命都不能被视为违法行为。例如打死一只猫,或者在反恐战争中杀

死具有恐怖分子嫌疑的人,都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但是政治权力不会主动去威胁动物的生存,因为后者并不会危害“有资格的生命”。作为 zoē 的动物相当于本体界的自在之物,游离于人类的政治世界之外,既不拥有 bios 也未被赤裸化。杀死 zoē 是中性的行为,仅仅是“不危害社会”。纳粹德国在捍卫“高贵的”雅利安人的纯洁血统与生存空间的名义下,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人,但包括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内的许多纳粹党高层都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动物不会危害雅利安人的生存。作为自然生命的 zoē 虽然缺乏政治权利的保护,但不是权力所指认的敌人和否定的对象。它会遭受自然的恶劣生存境况,但这种自然的困境与政治权力无涉。赤裸生命之“赤裸”是政治权力将其贬为有害之物并对其主动施加暴力的结果,杀死“有害”的赤裸生命是正当的、有正向价值的行为,是“保卫社会与生命”。因为杀死赤裸生命增益了另一部分生命的质量,唯此主权才能彰显自身捍卫“有资格的生命”的能力。

阿甘本以《圣经》中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的裸体状态类比了赤裸生命,指出“赤裸”并非人类本性的缺陷和不足,而是被神的恩典建构出来的,只能在否定意义上存在。亚当和夏娃赤身裸体本不觉得羞耻,只因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被上帝剥除了恩典之衣。上帝将恩典的缺失界定为原罪,才使亚当和夏娃变得“赤裸”^[24]。因此,阿甘本理论中的“赤裸”概念具有特定的内涵,它并不是指缺乏形式,而是指具有否定的形式。“赤裸生命”之“赤裸”不仅在于它缺乏政治权利的保护,更在于它受到政治权力的压榨,被赋予消极、否定的形式,人人得而诛之。对生命的赤裸化操作,不仅是剥除其政治资格,还要将主权的暴力施加于斯,使其直面死亡的威胁。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生命才会变得“赤裸”。

所以 zoē 并不是赤裸生命,它只是后者的质料承担者。在政治权力的作用下,zoē 才被再生产为具有 bios 的肯定性生命和否定性的赤裸生命。例如某个作坊将作为质料的陶土烧成陶器的形式后,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会将劣质的残次品报废。这些煅烧失败的废品既不是原初的陶土,也不是具有完善形式的产品。如果说 zoē 是陶土,具有 bios 的生命是塑形成功的陶器,那么赤裸生命就是所谓的无价值的残次品和边角料,必须被报废。政治生命与赤裸生命都是被政治化的 zoē,它们共同的质料“命”是同质的、无差别的和无形式的,但两者以不同的形式进入政治:完满的、优质的 bios 形式和破碎的、劣质的“赤裸”形式。

因此,部分学者将“赤裸”仅仅理解为“缺乏形式”“缺乏政治权利的保护”,才得出了“zoē 是赤裸生命”的错误结论。同时,还应当看到,这些学者之所以作如上理解,是因为没能把握阿甘本理论的“门槛”逻辑,没能理解“赤裸”作为政治秩序内外无区分地带的居间性,而是将其误解为政治秩序外部存在的属性。赤裸生命作为一个界限性的地带,它与例外状态具有同构性,构成了例外空间中与主权者相对称的另一极。如果说 zoē 对应的是外部、排斥、事实与动物,bios 对应的是内部、纳入、规范与人,那么赤裸生命就是生命的例外状态,是 zoē 与 bios、内部与外部、排斥与纳入、事实与规范、人与动物的无区分地带,政治共同体的建立与存续都依赖于对它的否定。它被排斥,因为它是“无价值的”和“有害的”;它被纳入,是因为权力必须通过否定它、杀死它来彰显自身保卫 bios 的能力。通过杀死赤裸生命,主权标识了界定政治资格内外的标准,这个标准可能是理性、道德、财产和血统,也可能是其他任何标准,因为这一标准是主权者凭借自身的绝对能力宣告的,所以具有随意性。

为了获得对 zoē 和赤裸生命关系更为妥切和具体的理解,我们需要考察阿甘本对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解读。霍布斯反对亚里士多德从人的外在本质出发构建政治的做法,认为必须从人的自然质料(zoē)出发去思考人性与政治。他设定了混乱与无序的“自然状态”,在此状态下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体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及自保,会相互攻击甚至先发制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就像是狼之于狼的血腥杀戮。因此,他诉求通过社会契约建立一个保护所有缔约者生命安全的“利维坦”。人们将维护自身生命安全的权利转移给主权者,与主权者之间形成了服从与保护的关系。作为契约产生结果的主权者并没参与缔约,所以不受契约约束。自然状态在主权者的身体上持存,使主权者保留了发动战争的自然权利,即绝对的生杀大权。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过是一种逻辑推演和假设,社会契约也并非真实的历史事件,其作用在于从学理上论证国家存续对于保全公民生命的必要性。“胆小鬼”霍布斯写作《利维坦》的起因是英国内战对个人生命安全与生活舒适的冲击,他笔下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并不“自然”,他假设的人性如追求肉体舒适、虚荣、骄傲与名誉,都是被现代文明社会所塑造的,而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不择手段地去获取它们,是文明社会的法律与秩序被移除后人们不受限制地放纵欲望的结果。

阿甘本深谙霍布斯之道,指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并非前政治、前法律的状态,而是社会失序导致的公民权利消解与法律条文失效的例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之所以表现得像狼,并不是因为呈现出前政治的自然生命状态(zōē),而是因为丧失了政治资格,在例外空间中呈现出人兽无区分的“狼人”状态。阿甘本指出,“狼人”是古日耳曼法律中“妨害和平之人”的形象,后者是违反法律的作恶者和强盗,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们而不犯杀人罪。因此,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下如狼一般的人并不是自然的动物生命,而是动物与人之间不可区分的赤裸生命。“自然状态实际上是一种例外状态”,主权决断指向的生命,“不是简单的自然生殖生命(古希腊人的 zōē),也不是 bios(有政治资格的生命形式)。更准确地说,它是神圣人和狼人的赤裸生命,一个人与兽、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不可区分和持续过渡的地带”^{[18](109)}。在阿甘本看来,政治共同体并非肇始于一纸社会契约,而是源于主权在例外状态下对赤裸生命的纳入性排斥。“通过把赤裸生命排斥在政治秩序之外,又把它捕获于政治秩序之中,例外状态以它的分隔性,实际上构成了整个政治系统赖以存在的隐蔽基础。”^{[16](9)}生命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就必然受到权力的染指,要么成为拥有 bios 的公民,要么成为作为门槛的赤裸生命,绝对无法回到前政治的 zōē 状态。

由此可见, zōē 并不同于赤裸生命。首先,作为自然生命的 zōē 是先于政治的自在之物,未被纳入权力的作用范围内,而赤裸生命是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被权力生产出来的,是 zōē 被政治化的产物(因此它也就不再是 zōē)。阿甘本在《神圣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中曾明确指出:“原始的政治因素不是简单的自然生命,而是暴露于死亡的生命(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18](88)}

其次, zōē 是无品质、无形式的。因为 zōē 的存在先于语言和伦理等一切人类规范系统,而赤裸生命是“无价值的”与“有害的”,应当被否定和排斥。语言和伦理是历史的产物,凭借语言,人类可以言说善恶,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排斥使生命进入政治并获得品质与形式,变得不再自然。即便古典时期将生命停留于 zōē 状态视为可鄙的,或者现代社会将不健康的 zōē 视为无价值的,但是一旦 zōē 被视为“可鄙的”或“无价值的”,它就不再是 zōē,而是具有否定与消极形式的赤裸生命了,因为它已经被纳入某种价值序列当中。

因此,赤裸生命是权力以否定的方式对 zōē 进行政治化的结果,通过对 zōē 的否定,赤裸生命被生产出来,并且成为政治共同体及 bios 的基础。赤裸生命不是 zōē,而是 zōē 和 bios 之间无区分的门槛,在区分两者的同时又接合了两者,是标识政治共同体与 bios 范围的界桩。一言以蔽之,“主权权力的奠基性活动是生产作为原初政治元素以及作为自然与文化、zōē 与 bios 之间接合门槛的赤裸生命”^{[18](181)}。

四、误读“zōē”与“赤裸生命”关系的原因

可以看出,部分学者之所以误将 zōē 视为赤裸生命,关键在于他们沿用传统的二分思维去理解阿

甘本的概念和理论, 因而未能把握其门槛逻辑以及“赤裸”的特定内涵。在这里仍然存在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部分学者对相关问题的忽视或误解。

对此, 亚里克斯·默里(Alex Murry)指出, 虽然 zoē 不是赤裸生命, 但它们看起来很相似, 并且在阿甘本的文本中它们甚至看起来被混为一谈^[9]。我们可以在阿甘本的文本中找到相关佐证: 他在多处将“zoē”和“赤裸生命”并列平行使用, 将“zoē/bios”和“赤裸生命/政治生命”同时作为西方政治结构基本范畴的二元对子。例如: “西方政治的基本范畴对子不是朋友/敌人, 而是赤裸生命/政治存在, zoē/ bios, 排斥/纳入。”^{[18](8)}这里的表述将赤裸生命、zoē 与排斥一一对应起来, 仿佛在说 zoē 就是赤裸生命, 是被排斥在共同体之外的存在。

此外, 阿甘本还将“zoē 进入城邦的领域”与“赤裸生命本身的政治化”并列论述, 仿佛在说两者表述的是同一件事。“zoē 进入城邦的领域——赤裸生命本身的政治化——构成了现代性的决定性事件, 标志着古典思想的政治哲学范畴的根本转变。”^{[18](4)}“zoē 进入城邦的领域”与“赤裸生命本身的政治化”构成了“现代性的决定性事件”, 指的就是原本在西方古典社会中存在于家庭领域的生物性生命, 在西方现代社会中进入了政治的中心场域, 成为政治权力的捍卫对象以及筛选生命优劣、区分赤裸生命与“有资格的生命”的标准。在这里, 阿甘本明显是将 zoē 与赤裸生命等同起来, 将它们都视为生物性生命的。

阿甘本在文本中经常将“zoē”和“赤裸生命”并列使用、似乎将两者等同起来的做法造成了表述上的含混与矛盾, 很容易让人沿用传统的二分思维去理解他相关的概论与理论, 忽视其门槛结构的逻辑, 误认为不具有 bios 的赤裸生命就是处于政治外部的、不受保护的自然人生命 zoē。莱彻特和纽曼指出: 阿甘本文本中的赤裸生命具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作为生命政治管理对象的个人、民族与种群的生物性肉体, 即 zoē; 另一种则是人被剥夺政治权利和公民身份后、既不是人也不是非人、处于“禁止”和“例外”状态下的生命。只有在第二种形式的赤裸生命中, 才会出现一个无区分地带^{[3](63)}。当然, 从阿甘本的理论逻辑来看, 他们的观点是调和式的, 毕竟阿甘本自己也明确表示过, zoē 不是赤裸生命, 而是 zoē 与 bios 之间无区分的门槛。当权力对人的生物性肉体进行管理的时候, 是以设定“正常”与“健康”等标准的手段对生命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 其作用对象确实是 zoē。然而, 此时的 zoē 尚未被权力所否定, 其被标准化的过程正是获得 bios 的过程, 它所面对的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式的规范性、生产性的生命权力^①, 因此它并不是赤裸生命。无法被标准化的生命则会被纳入性排斥地置于例外空间, 它所面对的是阿甘本式的例外的、死亡的生命权力, 只有这一类生命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赤裸生命。

五、结语

通过前文的分析与考察,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zoē 是前政治的自然生命, 而赤裸生命与具有 bios 的生命都是被权力政治化的不同产物, 同为政治秩序必要的组成部分。第二, zoē 是无形式的质料, bios 是 zoē 的肯定形式, 赤裸生命则是 zoē 的否定形式。权力要肯定一部分生命, 赋予其 bios, 就必须否定另一部分生命, 将其赤裸化, 这是一种悖论式的扭结。第三, zoē 处于政治秩序的外部, bios 处于政治秩序的内部, 而赤裸生命存在于政治秩序内外无区分的门槛, 即例外空间之中, 被政治秩序纳入性地排斥。赤裸生命亦是 zoē 与 bios 之间相互穿透与交织的无区分门槛, 是生物性生命与政治生命的居间形态, 标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综上, “zoē”不是“赤裸生命”, 两个概念在逻辑上不能简单地等同。部分学者在面对阿甘本含

混而矛盾的文本表述时,因为使用经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二分思维去理解相关概念,得出了“zoē是赤裸生命”的错误结论。把握阿甘本“赤裸生命”概念的门槛属性,是理解阿甘本相关理论的必要入口,也是深入阿甘本应对生命政治策略的必由之路。门槛既不在内部也不在外部,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它在使二元区分成为可能的同时,其自身作为拓扑地带^②(topological zone)却无法被二元区分所作用,因此提供了悬置、消解二元区分的潜能。

注释:

- ① 作为“生命政治”概念的开创者,福柯与其接力者阿甘本所界定的“生命权力”的内涵有所区别。阿甘本的“生命权力”侧重于以结构分析勾勒西方政治史中共时性的、宏观的、否定性和暴力性的主权权力,其作用对象是失去权利保护而暴露于死亡权力之下的赤裸生命,即无法被规范化的生命;而福柯的“生命权力”则侧重于描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具体历史时期中出现的微观的、生产性的柔性权力机制,它可以被细分为规训肉体的规训权力和治理人口的生命权力,其作用对象正是无差别的生物性肉体,也就是阿甘本理论中的 zoē,其目标正是生产出整齐划一的标准化生命,也就是具有 bios 的生命。
- ② “拓扑”(topology)是一个地形学概念,指的是几何图形或空间在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性质。它只考虑物体间的位置关系而不考虑它们的形状和大小。而所谓“拓扑地带”指的就是几何学原理各空间之间的相邻、连接、重合、相互包含与贯穿的位置,阿甘本使用这一说法形象地勾勒了作为门槛的例外空间地貌。

参考文献:

- [1] 张一兵. 遭遇阿甘本: 赤裸生命的例外悬临[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20.
- [2] 法特. 法与生命的神圣性——阿甘本生命政治简介[C]//孙辉, 译. 汪民安, 郭晓彦. 生产: 第7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97-114.
- [3] LECHTE J, NEWMAN S. Agamben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 rights: Statelessness, images, violence[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 [4] 吴冠军. 生命权力的两张面孔——透析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论[J]. 哲学研究, 2014(8): 77-85, 129.
- [5] MILLS C. Agamben's messianic politics: Biopolitics, abandonment and happy life[J]. Contretemps, 2004, 5(1): 42-62.
- [6] MURRAY A, WHYTE J. The Agamben dictionar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30, 39.
- [7] LEMKE T.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M].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62.
- [8] GENEL K. The question of biopower: Foucault and Agamben[J]. Rethinking Marxism, 2006, 18(1): 43-62.
- [9] 默里. 为什么是阿甘本?[M]. 王立秋,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 [10] 姚云帆. 神圣人与神圣家政: 阿甘本政治哲学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62-64.
- [11] 德里达. 野兽与主权者: 第一卷[M]. 王钦, 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21: 503.
- [12] BRATTON B. The revenge of the real: Politic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M]. London: Verso, 2021: 111.
- [13] 拉比诺, 罗斯. 对当前生命权力概念的思考[C]//张凯, 译. 汪民安, 郭晓彦. 生产: 第7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78-96.
- [14] 汪民安. 何谓赤裸生命[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8(6): 88-96.
- [15] AGAMBE G. What is a destituent power?[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4, 32(1): 65-74.
- [16] 阿甘本, 豪尔夫. 阿甘本访谈录[C]//王立秋, 译. 汪民安, 郭晓彦. 生产: 第7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51-55.
- [17] SCHMITT C.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7.
- [18] AGAMBE G.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9] AGAMBE G. The coming communit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3: 66.
- [20] AGAMBE G. The use of bodi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21] 阿甘本. 潜能[M]. 王立秋, 严和来,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4: 395.

[22] 阿甘本. 什么是哲学? [M]. 蓝江,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34–35.

[23]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203–204.

[24] 阿甘本. 裸体[M]. 黄晓武,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05–106.

Is "zoē" "bare Life"?: Rethinking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basic concepts of Agamben's political philosophy

ZHENG Yuchen^{1,2}, WANG Yuchen²

(1.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65,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Zoē" and "bare life" are two important basic concepts in Agamben'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re have existed different views in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So,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logic of Agamben's theory. The key to distinguis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ncepts l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Agamben's "threshold", which is the zone of indistinction that combines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something that is included by the system in an exclusive way, and that mak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nterior and the exterior possible. "Zoē" is the simple fact of "living" common to all living beings, which corresponds to "bios", a better form of political life. "Bare life", which is the negative basis of politics, is produced by political power through the inclusive exclusion of "zoē". By denying "naked life", political power makes another part of life acquire a political form "bios". Therefore, "zoē" is formless life that has no connection with politics, while "bare life" is the prod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has a negative form. "Bare life" is not "zoē", but the indistinctive threshold between "zoē" and "bios", which marks the distinction that distinguishes "zoē" and "bios".

Key words: Agamben; threshold; inclusive exclusion; "bare life"; "zoē"; "bios"

[编辑: 胡兴华]